

唐宏经同志对一九四二年前后进行革命活动和“八一五”后在大连搞工会等情况的回忆

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

一、一九四二年前后和一些同志的接触及活动情况

- 1、关于见到于全福的情况..... (1—2 页)
- 2、关于见到朱秀春的情况..... (2)
- 3、关于见到王赞升的情况..... (3)
- 4、关于见到邹明顺的情况..... (3)
- 5、关于见到张洛书的情况..... (3—4)
- 6、关于和朱秀春等人研究是否出走的问题..... (4)
- 7、关于张洛书等人被关押的情况..... (4—5)

二、“八一五”后的活动情况

- 1、关于重新组织工会的情况..... (5—7)
- 2、关于成立共产党小组和唐宏经同志参加组织活动的情况..... (7—8)
- 3、关于工会训练班的情况..... (8)
- 4、关于和卡茨洛夫相识的情况..... (8)
- 5、关于工会与资本家斗争的情况..... (18—9)
- 6、关于和韩光相见的情况..... (9—10)

三、对有关几个历史问题的回忆

- 1、关于山东来的同志组织职工追国会的情况..... (10)
- 2、关于朱秀春等人的线索..... (11)
- 3、唐宏经同志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..... (11—13)

唐宏经同志对一九四二年前后进行革命活动和“八一五”后在大连搞工会等情况的回忆

1982年5月23日

一、一九四二年前后和一些同志的接触及活动情况

(1) 关于见到于全福的情况

我回大连最早见到的是于全福。他是在二七年事件中被捕的，判了六年刑，刑满出来后回家（他是皮口人）。我到城子疃办事情，碰到他了，他落泪了。我说：“哭什么？不要哭了，罪都遭过了还哭什么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找工作都找不到，生活很困难。”他大概有五、六口家。他问我住在哪，我告诉他住在三十里铺。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到我那去。后来他来到三十里铺找我。我问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说：“‘做点小买卖，生活还可以’”。又说：“‘坐监狱白坐了’”。我说：“‘那你找谁算账？’”他说：“‘难道就叫敌人在监狱教育一下教育好了？’”我说：“‘现在我特别留意找党的组织，有人说什么‘青红帮’在‘家礼’的和党有关系，说是在抗联里面咱们战士和敌人见面问：‘你们有姓潘的吗？’我想是不是在‘家礼’就可以找到党组织呢？以后我就加入‘家礼’，认师父。后来一看不对，在这里净是些腿子，不三不四的人，不可能有党的活动，就离他们远了’。这是1935年。我跟

于全福说：“你从监狱中出来，不要认为出来后就没事了，敌人还在监视，暂时不要活动，心里不要忘记党就行了。”他在我那里住了一天。我告诉他，好好做买卖，别忘记以后找党。我们决定以后有机会互相来往。这是第一次见到于全福的情况。

(2) 关于见到朱秀春的情况

我是三八、三九年见到朱秀春的。他在大连宝荣一个白俄开的花生庄工作。他会苏联话，在那当翻译。花生庄负责人姓张叫张大仑，我和他也不错。我问朱秀春从哪来？他说：“从大连”。我问他来干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是克福洋行的。”我当时告诉他，我也有个买卖叫“德盛号”是卖苹果的，叫他有功夫到我那去。过了一两个月，他到我那去了。我说：“你不在莫斯科念书了吗？怎么在家呆着呢？”他思想情绪不大好。他说：“念书受气”。我说：“念书受什么气？”他说：“都勾心斗角”。我说：“都是学生有什么勾心斗角的？”他说：“嚯！一样有斗争，结果是我们不吃香。回国后派了工作但由于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，加上精神作用，认为恐怕有人追随，最后也就没去。以后，想去也不行了，接不上头了。后来就在克福洋行找了个地方。”我说：“你学习了一大阵子白学了？”他说：“有机会还得干。”我说：“机会是会有的，党培养一大阵子忘了党不行。”并且提醒他说：“你我都是大连人要注意，过去遭受到的损失和教训要吸取。”尔后我们再见面就谈做买卖了。

3、关于见到王赞升的情况

我和王赞升见面是在见到朱秀春前后。一九二八年十二月，在沈阳开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他也参加了，也是这次被捕的。他被押了七、八个月，出狱后，就没有见到他。这次见面是在大连。那时，听说他在大连弄了几个人开了一个“三盛工厂”（是做灯泡之类的工厂）。他有了地方，我有时去大连就去找他。我说：“你这回当了掌柜的了。”他说：“能饿肚子不吃饭吗？”我说：“别忘了我们入党时说的话，得对说过的话负责任。”我们表完了态度就不谈这些，谈做买卖一类的事情。

4、关于见到邹明顺的情况

邹明顺，旅顺人，他也开了个小工厂。我说：“都开工厂当资本家了。”他和我一样都是铆工匠。我问：“有多少人？”他说：“十三、四个人。”“还有什么机器吗？”他说：“干这种活要什么机器，就是有机器的也不会使用，对付着吃饭呗。”

5、关于见到张洛书的情况

一九四二年，在大连西岗子菜市车站我见到了张洛书。上车时我没看到他。他喊：“老唐！”我一看是他，就说：“你还没死呀！”他心脏病很厉害。他是在山东入党的。组织上曾准备调他去莫斯科学习，到哈尔滨一检查身体有心脏病，结果没让去就留在哈尔滨了。我

们俩手拉手来到现在的鲁迅公园，讲了一下晌。他是个有文化的人，经常注意看报。他向我讲了延安整风和不少党内的事情。分手前，我问他生活怎样，他说可以。我给他四十元钱，他不要，说他老婆做小买卖挣钱。我说：“我开字号不比你强得多吗？”我问他：“你在哪住？”他说：“在西岗子福兴里北院二楼二十一号”。但他不让我去他家，说那里三天两天一查。我把地址也告诉了他，叫他有什么事情写信告诉我。但以后没有见到。

6、关于和朱秀春等人研究是否出走的问题

四二、四三年间朱秀春提出要走，去找党。他说：“能老在这做买卖吗？”我说：“在这也没有什么意思，但要走也得有个目标，盲目的去找也找不着，另外找得花钱，得需要不少路费，钱少哇。”我对朱秀春说：“你是不是没开字号，人家王赞升开‘三盛’就不走了”王赞升说：“叫你说的”。他们问：“不走遇到事还干不干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要干，八、九年监狱白蹲了。”当时我讲了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咱们有几个人互相都知道，大家没有忘记党，思想还是好的。但先不干，都有线，你一干，人家就知道，暴露了损失大，得不偿失。当时我还说：“你们谁走，找到了线给我个信”，后来都没走。

7、关于张洛书等人被关押的情况

张洛书是大连市委书记，因叛徒告密被逮捕，在狱中押了十年，出来时衣服都脱不下来。他老婆好，来大连照顾他。他有一帮人，这

帮人情况我不知道。在大连被捕的邓鹤皋也是十年。王群十年。被抓的也有六年、三年的，但凡是书记都是十年。

二、“八一五”后的活动情况

1、关于重新组织工会的情况

“八一五”以前我就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了，准备走，这时朱秀春捎信叫我去大连。信上把我好顿说（是说笑话）：“你还在家干‘德盛号’？该走了！快来吧！”接到了这封信，八月十二、三日，我就到大连。到了朱秀春家，他妻说：“三哥你怎么才来”我说：“还晚吗？”她说：“你兄弟好着急”，我问她：“他在哪？”她说：“他在（日本人垮台后中国人组织的）治安维持会当翻译。”我没有等朱秀春，就去找张洛书，找到了西岗子福兴里北院2楼21号，进去一看满屋子人。张洛书问我为什么才来，紧接着他做了介绍。屋里的人吵了一会，多数都走了，剩下六、七个人。我说：“日本人倒台六、七天了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没干什么。”我说：“党的方针政策不懂？不懂就不干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还写了信给苏联领事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写了多长时间了？”他们说：“六、七天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写着了，我们找组织不好找，我们把工作干起来组织找我们好找。”他们问：“怎么干？”我说：“我原是工学会付委员长，咱们组织起来就干！你们不是怕犯错误吗？党有一条就是

组织群众，这样干不仅没有错，而且还有成绩。”于是我们几个人分了分工，分别到几个工厂去发动群众，定于二十六日会会面，当时决定先把大厂子：铁道工厂、造船厂、沙河口机器厂、市政和码头抓起来，小的厂子就可以被带起来。八月二十六日碰头时没找到几个人，才十八、九个，这哪行。我对找来的人说：“大家还想着工学会吧？咱们还得干工学会，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我们的工学会，使我们工人没有说话的地方了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垮了，苏联是支持我们的，不要怕，要大胆干。你们得去找人，这么几个人，成立什么工学会。”这回定二十九日开会，结果又没有召来多少人，又多招了个人，共计二十多人，大家想还去找，我讲别找了，赶紧成立工会，把牌子先挂起来，然后分头再去发动、找人。定于九月三日，召开成立工会大会。在什么地方开会呢？过去的大连中华青年会就在眼前，听说黄了，也没变成什么，我们决定就借这个地方开会。我们在楼下找了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室，以为不能来多少人，结果出乎意料之外，来了二百多人，这样不得不又换到礼堂去开会。会前，我跟张洛书说：“你讲。”因我开除的事只有他知道。张洛书让我讲。我讲：“到各厂把大家召来有事商易商易，什么事呢？就是要成立工学会。有些老同志都知道工学会，青年人不知道。那时有工学会，工人有主张，有点什么事跑工会来说，工会想办法来帮助解决，工会被打垮了，大家象没娘的孩子，这几年人家想怎么的就怎么的，因此，我们还想把工

学会组织起来。我还告诉大家不要害怕，丁日本人已经垮了，苏联是支持我们的。讲完，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成立工会，都说赞成。成立工学会，得选负责人，互相都不认识怎么选呢？我说谁愿为工人办事就选谁去，但也不知谁愿为工人办事。我提议参加会的五十二个厂子，每个厂子出一个委员，来人多的从中推选一个，不要认为我厂子人多，怎么就选一个？这是暂时的。委员选出后，马上开会了，我说：“工会成立了你们都是被选的委员，不是选出就拉倒了，要为工会办事，不能辜负工人的希望。”在五十二个委员中选出由十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常驻工会。在十五个常务委员中还得选出个头。我说：“这个头不用选，我就是头，我是工学会的付委员长，现在成立的工会，还是在老工学会的基础上，委员长不在（指付景阳）我可以代替。”大家说：“好！俺们也不懂，你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”我说就这么办。代表们还在等着。我把选举的情况跟大家说了说，然后问大家大连工人有多少，回答是二十万，我说咱们才二百多人怎么行，回去后要把大连二十万工人都组织起来，工会才有力。散会后，常委会研究解决工会办公地点问题，决定占用劳务会（日本名）办公楼（在大连西岗子布劳街）。

2、关于成立共产党小组和唐宏经同志参加组织活动的情况。

八月十六日——十七日，成立了共产党小组人员有：张洛书、桑凤岐、王起焕、朱秀春（这个小组里没有张寿山、左友文，他们是另一帮，是从山东来的，他们来后，和我们没有来往。）我因被开除不能参加小组。一开会，我就走。他们开完会就让我参加。后来，不是

朱秀春就是王起焕说我在外边也不行。张洛书找我谈，让我参加组织，我说你们说的算，我反王明被开除，这化事旁人不知道，就你知道，你们组织决定我参加，我就参加。这以后我就和他们在一起研究什么事也没关系了。这是八月底。

3. 关于工会训练班的情况

工会训练班，办了七次，把工人中比较积极的都吸收进来。训练班是在一个大戏院里举办的，每次训练三、四百人，并从中吸收发展党员。经过这七次训练班把党的组织铺开了，到处是党员，这是和东北局接上关系，十一月以后的事。

4. 关于和卡茨洛夫相识的情况

我和卡茨洛夫认识是在双十节游行之后。十月十日“双十节”，苏联也让我们参加庆祝，天热会场纪律不好，唯有工会会员队伍整齐。卡茨洛夫问：“这是那的队伍？”有人说：“是工会的队伍。”卡茨洛夫说：“把头头叫到司令部。”我就是这样和卡茨洛夫见面的。从此后我们经常见面。他五天不见我，就给我挂电话，叫我去一趟。卡茨洛夫是苏联最优秀的人物。那时苏军军纪不好，闹的不象样，闹的太厉害了我就和他讲讲，他真管。旅顺那个大将坏，我没有见到。

5. 关于工会与资本家斗争的情况

大连有六十万工人，工会会员没有很好统计。当时工会会员没有

履行什么手续，韩光不知道这个事。韩光去了，我们领导工人斗资本家的事过了。我们约摸从资本家那拿出二千万，用马车往家拉钱。那时工作太忙了，应当有计划的给工人分，后来没办法就让他们自己分，分钱有几个原则：一个不能按级别分，这不是做工挣的钱，有头就算。再一个不能谁负责任有辛苦钱。还有一个，共三条。分完了，零钱多了，没法分，就送总工会，总工会不要，让他们拿回放在厂工会保存。

6. 关于和韩光相见的情况

见到韩光，我们很激动说盼你们眼睛都盼穿了。跟他说，我们做了许多工作，不知道做的对不对，请你们来批判。我说：“天天找哇！”“这个地方假八路也太不少，足有一千多人，我们一看不对头，不是共产党和八路，因此，也就不和他们接头，我们自己就蒙着头干，而且同志们都提心吊胆”向他汇报完了，他一口一个正确，还说不仅现在正确今后还是照这样干。我放心了，没有错。他接着就做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，完了就要走，我说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。他说得回去一趟，五、六天就回来。

我们在大连同组织接上关系和韩光接上头是经过董崇彬。他打电话到工会，我没在家，是张洛书接的。董崇彬在电话中说：“你们心中想的人来了，你们来吧”。是张洛书去的。张洛书认识韩光，韩光

在哈尔滨满洲省委时叫小孟。韩光见到张洛书问老唐是那个老唐？张洛书说：“是哈尔滨老唐，你不知道？”韩光说：“还是他呀！”他告诉张洛书说：“今天晚上留一部分比较好的坚定分子，我去一趟。”张洛书回来说：“来了！”我问：“谁来了？”他说：“党来了！是小孟来了”。我说：“那更好。”他说：“要留下几个人”。晚上韩光来了。

三、对有关几个历史问题的回忆

1、关于山东来的同志组织职工站国会的情况

“职工站国会”是“八一五”以后，由山东来的张寿山他们组织的，时间不长就取消了，都是大连市工会了。

白全武、车长宽、房木等青年在西岗子日本人金光教挂起了“社会主义研究会”的牌子，他们向我汇报说只发展了几个人时，我就火了。我说：“这个时间，你们今天发展一个，明天发展一个，这叫什么工作方式”。“学生闹的很厉害，不到学生中去怎么行。”我批评了他们。他们有八、九个人，白全武是个知识分子。还有车长宽、房木、于明。于明他戴个战斗帽到处找共产党，大家说，你这是什么玩艺找共产党。那时他们和学生联系不多，当时的学生工作挺棘手，今天闹，明天闹，都闹到政府大礼堂。学生工作由于没人做，都叫国民党给抓过去了，是郑仁龙等人抓过去的，郑仁龙是个头，解放后他被枪毙了。

2. 关于朱秀春等人的线索

朱秀春现在大连，住在他女儿那。地址：大连市岭前街81号朱转。他身体不好，已不干什么工作了。他也是六大代表。他是个团员，周恩来同志说怎么弄个团员来，你们出俩个介绍人。经我和张任光介绍朱秀春入党。这个党员不简单，是六大的七十多个代表，全体通过的。

王传璧死了。

于志勋还在大连。他消极，俺们干的那么轰轰烈烈，我说你还在家干什么，他也没吭一声，出来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
3. 唐宏经同志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

问：第一届满委有你吧？

唐：第一届满委名单有我，是吴丽石告诉我的。我不干，他找我，让我上省委，我说：“我上省委干什么？我说也不能说，写也不能写，我到工厂里把工人组织组织，我和工人有共同语言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名单已经有你了。”

问：请介绍一下刘少猷的情况？

唐：我没见过他。王立功在医院养病一看我们都被捕了，病也不养了，就把我们的一摊子工作搞起来了，那时他就是书记了。后来中央就派刘少猷来，他们弄不到一块。以前中央就调王立功，满委不给，这回中央调王立功去汇报。我在监狱出来后，被派到上海去学习，是和王

立功一块去的。

问：你到省委接替王立功工作时，这时省委的秘书长是谁？

唐：是廖如愿。

问：一九三〇年四月到冬天，立三路线正在贯彻，这时除了调些朝鲜学生砸领事馆以外还干了些什么？

唐：搞飞行集会呀。

问：砸领事馆是五月份的事，立三路线是六月份以后？

唐：一九三〇年立三召集了一个会，省委派杨一辰，哈尔滨派孟坚参加。回来后就在省委贯彻，当时我不同意。孟坚讲要跟上形势，跟不上形势不行，革命高潮来了，如洪水猛兽一样。我说好，干吧。他说你好象对这个路线有意见，我说什么意见？他说那你怎么无声无息。我说：“党的政策和主张到了支部我毫无保留的讲。”我说明天大家去。南岗电车公司有个支部三个人我和孟坚去那里。有一个同志不在，结果两个人也开会，我讲了一通后问：“同志！看还有什么意见。”我去讲话也没抬头，问道他们，他们也没吭声。走吧？俺们也没法走，我就说，有一个同志没来，等他回来，你们把这事讲一讲，你们再研究研究，我再来听一听。他们说好。我们俩走了。我和孟坚在一块住。回来他往床上一躺，我说吃饭了，他说有问题呀！我说什么问题，他说有路线问题。他说给俩个人开会不但头不抬而且连声都不吭。我说你不说我右吗？他说这个问题得考虑考虑。到了五月一日，林仲丹同志来了，搞飞行集会和打领事馆是他搞的。林为什么来北满

因北满这时组织了“皮鞋罢工”“皮鞋罢工”(是3月份)胜利结束了。俺们给省里写报告把罢工的情况都写上了。他一看这儿有群众基础,他就去了。去了后,就要搞飞行集会。朝鲜学生、青年是从山里(珠河等地)调来的有四十多人,打领事馆是二十多人,岁数大的都走了。林仲丹说咱俩去呀?我说走吧。结果打完了,被包围起来。我也被包围了。我说你们包围我干什么,他们一听我说中国话,说你跑这来干什么,快走。结果把这二十几个人抓去了。我对林仲丹说:“这有什么意思。”林仲丹说:“这政治意义大。”我说:“把二十多人抓去了,有什么政治意义。”他说我的思想有问题。搞飞行集会抓去了一个李长新。四月二十九号晚上开了个行动委员会会议,林仲丹住在一个毛子小馆写文件,有二、三十人到他的住处开会,结果叫敌人堵在屋里。林仲丹说:这是我的朋友来看我的。这时门被一个人给锁上了。林仲丹把钥匙夺了过来,拿着壶要打水,那个人拦着说:“不用打水”,林仲丹说:“你不喝水,我这些朋友还不喝水吗?”这样他就把门开开了,大家乘机都走了。大概这次只抓走了两个学生,一个是从上海来的姓李的,一个是从山东来的。

访问人: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:张一波 李洪达

许庆昌 刘贵田

记录整理:刘贵田。

回忆

（~~高子升同志~~）

第 1 页

回忆材料
高子元

（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）

一九二三年春，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

协会在广州开会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是部

刚去参加的。回来时，他从广州带回来十

几本社会主义书刊，交给了我。现在能记

起的主要的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及

《列宁传》，考茨基的《阶级斗

争与政权之路》；《苏维埃政权的成

功与困难》等。这些书我当时还看不太懂，

于是我就把书拿到吴竹郁、高子升那里给

他们看。当时高子升已经有了日文的《资

本论》，还有日人河上肇、片山潜等的

社会主义著作。当时我和高子升、吴竹郁

有时还到一起研究一些问题。但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。

一九二四年春^{中央}党派韩乐然到奉天。韩乐然是延边龙井村人，高尔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。“三·一”事件后，高尔基共产党把他派到上海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，后成为中共党员。他在上海美术学校学油画，通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，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个~~个~~美术展览。这时我就与他相识了。不久，他又在奉天办了个私立美术学校。我俩常在一起聊天，后来他把我介绍给朱霁清，当时朱霁清正物色人员往广东黄埔军校送。回来后，我向韩乐然说，广东我不去，我要找共产党。此后，